

符号认同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一评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一

李凯航¹

在近年对“中国”、“中华”等等民族认同的研究热潮中，杨瑞松的《病夫、黄祸与睡狮》（政大出版社，2010年，以下简称“杨著”）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不同于以往在中国民族主义论述中片面地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偏见和中国近代史的“受害者情节”，杨著所关注的是东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作用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正如其在第一章《导论》中所言，“西方的中国形象和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想像，虽然有其各自复杂的发展历史和有关主题，并且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可谓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Eurocentric）的偏见，但是从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而言，两者之间却产生了重要的关联性。它们二者之间的交会处，也就是本书探索研究的焦点。”（5页）

基于以上视点，杨选择了三个原本产生于西方，但在随后流传于中国的时期内产生重大变化的中国形象（符号）、即“病夫”、“黄祸”、“睡狮”。在对这些形象的研究中，杨所要做的并非像萨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一样，对所谓的“东方主义”进行一整套文化化约论、本质论（reductionism, essentialism）的批判（2页），而是企图重新审视这些符号历史化（historicise）之过程，强调在不同历史背景中这些符号被不同利益群体所赋予的不同内涵。正因为如此，杨著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史的批判深入到了民族国家其自身的建构过程之中。

比如在第二章中，杨通过对“东亚病夫”这一意象分析了东西方在近代中国的国族想象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众所周知，“东亚病夫”

自晚清以来一直是中国人重要指涉，不论是报纸（《新民报》、《万国公报》、《字林西报》等）、小说（《孽海花》）、电影（《精武门》），甚至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宣传中，“东亚病夫”都一直被当做重要的国族符号，以引导中国人加强对健身强体以及由此所展示出的国家形象的关注。但是，杨对“东亚病夫”的历史源出与流变的分析表明，其原型其实与个人身体特征并无关系。据杨的分析，“病夫”一语最早的政治表达是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一世（Tsar Nicholas I）在1853年对土耳其的看法“Sick Man of Europe”，旨在形容土耳其因改革不利导致被列强分割的窘状。鉴于同样的语境，“东亚病夫”（Sick Man of East Asia）也是欧洲评论家对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于日本后改革失败的描述。杨提醒我们，这些评论大都是指责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看不出 Sick Man 这一名词有任何指涉中国人民，尤其是有关中国人民体质或日后所谓体育的相关课题的情形。”（30-31页）那么，“东亚病夫”是如何与中国普通人民的“生活”与“身体”相关联的呢？杨指出，梁启超（1873-1929）对“东亚病夫”的意解转换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梁一直对“病夫”一词在欧洲政治语境的具体指涉相当熟悉，比如“东方有病夫之国二，中国与土耳其是也”（《俄土战纪叙》，但在其《新民说》中，从“我以病夫闻于世界”，“二千年之腐气败习，深入国民之脑，遂使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一文可以看出，这里的病夫是指“四万万中国人皆为病弱之躯”。（37-38页）从这里开始，“病夫”从西方人

对晚清改革不利的指责，变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身体体质、健康、卫生等的追求。杨指出，这种转换首先离不开晚清在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所产生的“亡国灭种”的焦虑感，在维新改革者的论述中，“强国必先强种”、“卫生强种”被视为不二法门。其次，在近代科学与进步主义的检视下，由鸦片与缠足导致的中国人形象的畸形与病态，刺激了“病夫”形象。最后，“病夫”作为最帝国主义的控诉，中国知识分子企图以“受害者意识”

(victimization narrative) 呼吁改革与进步的紧迫性。(56-59 页) 借此，杨一方面回应了号召“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的柯文命题 (Paul A. Cohen, 1934-2007)，即抛弃西方中心论，回到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研究中国；另一方面也正确地指出，柯文命题之所以不易，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又积极主动地借用甚至挪用西方历史分析框架以描述本国历史。原本是对清政府改革失败的谴责的“东亚病夫”一语，最后转译为对全体中国人身体及民智的嘲弄，并不是西方人所为，而是中国人自身在特定历史背景中产物。

在第三章中，杨主要探讨的是在清末民初语境中，西方舆论中的“黄祸”意象如何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问题。原本“黄祸”是德皇威廉二世为了抢占远东地区的殖民地而提出的政治口号，旨在污蔑中国人和日本等黄色人种的崛起会给欧洲带来威胁。但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却对其含义加以篡改及挪用，“黄祸”成为了旨在证明中国人能力的象征。与以往的学者仅仅强调“黄祸论”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对中国最丧心病狂的谩骂”（周宁，罗福惠等）等简单的道德评价相比，杨的研究着力于还原当时的政治语境。即，围绕着在变革时期中国的自我认同，“改革派”和“革命派”都借助于“黄祸英雄像”来寻求自身政治主张的合理性。(90 页) 在本章中，杨先从“认同”的角度阐释了“黄祸”是在西方的人种主义的

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符号，旨在贬低黄色人种以维持白色人种的优越地位。但是，在清朝末年的人种论的语境中，“黄色”与中国传统的“皇权”以及“黄帝”等等积极的政治意义相联系，“黄色人种”不但不是劣等人种，而是一个可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的人种。在这一过程中，杨强调了明治日本对中国的重要影响。考虑到三国干涉后，日本同样面临着被指责为“黄祸论”的巨大压力，“黄白人种大战”的论说在日本的各大新闻报纸中也广泛被宣传。以《清议报》、《外交报》，《中外日报》为代表的中文报纸便从中摘取大量的日本“黄祸论”社评介绍进中国。(91-98 页) 然而不同于日本的报纸对黄祸论的驳斥，中文的报纸强调的是“西人深畏中国人，向有黄祸之语相互警劝者”（梁启超语）。近代中国的语境中的“黄祸”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日本。杨指出存在着一种“自我东方化”的思维模式，即，明明是用于指责中国的符号“黄祸”，在中国的语境中中国人却把它挪用于证明自己优越的象征。杨提炼出晚清的“每谈黄祸我且栗，百年噩梦骇西戎”（梁启超）、“黑鬼红番遭白堕，白也忧黄祸。黄祸者谁亚洲我，我我我！”（黄遵宪）等等诗句，得出结论：在晚清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看来，“能被白种人视为具有强大威胁性的‘祸害’形象，不啻是一种最高荣誉的象征。”(95 页) 这样一来，在晚清中国国族论述想象中，“黄祸”这一历史形象成为了比“病夫”以及“睡狮”更为极端的自我想象。

在第四章中，杨探索了“睡狮”这一中国形象的变迁历史。虽然“睡狮”与“病夫”和“黄祸”都是近代中国的重要形象，但前者比后者的历史变迁更为复杂。(110 页) 一般而言，由于胡适(1891-1962)的引述，近代中国人都认为“睡狮”这一形象出自法国国王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130 页) 然而，据后来历史学家的考证，此说为无稽之谈。(112 页) 尽管西方媒体中对中国不时有“sleeping monster”的指称，但鉴于“狮

子”是当时世界头号列强英国的形象，把“睡”与“狮”相结合用以形容中国是不可能之事。

(115页)尽管如此，杨指出，“沉睡”这一在启蒙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中用以表示落后与愚昧的形容，在近代西方世界中用以代表中国却是常见之事。首先反驳“沉睡”说的是晚清驻外使节曾纪泽(1839-1890)在1887年发表的英文论文“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117-118页)然而在这里曾仍然视中国为一个“沉睡之人”，与任何动物意象无关。这里刻意地把中国从“人”转为“狮子”的是梁启超。“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谓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动物谈》，1899年)据杨的分析，梁的挪用仍然源自对中国改革的失望。不同于曾在论文中对中国的乐观主义，梁认为“酣睡是常态，偶然的苏醒不过是带来更严重的沉睡。”(122页)然而意外的是，梁的“睡狮”意象在此时却被革命派利用，用以表达汉族人在满人压迫下的昏暗状态。由此，“睡狮”才获得了一种类似于“黄祸”一样的意指“潜在的威胁力量”。

(126-127页)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洗礼下，“睡狮”这种略带恐怖意味的历史形象被新青年们否定，于是才有了胡适所谓的“中国睡美人”之说。(130-131页)此外，在党权日益扩张的国民革命年代，“睡狮”被认为是“专制中国”的象征而被其时代所否定。(133-134页)通过对“睡狮”这一意象的历史追溯，杨所要表达的是，任何一个意象的“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往往会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会产生巨大的分离，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国族认同的艰难构建中，各个利益群体(中西，汉满等)的不同诉求，往往会使得同一话语产生不同历史影响。而历史学家应该关注的并不是历史化的结果，而是历史化之过程。

通过以上的分析，杨在第五章中总结道：诚如本书对这三项符号的分析所显示，虽然它们本身可謂是化约思维的产物，然而这些符号

其实并非如一般公共记忆所认为仅仅具有一成不变的含义。相反地，从历史复杂演变的过程而言，它们不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东方化”的产物，更在此种“挪用”的基础上，产生更多的意涵变化；而且针对它们自身各种意涵的辩论，包含各种批判反省的声音和“异见”恰恰构成理解它们复杂历史涵义的重要历史脉络。(142页)虽然在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中，民族的象征性符号一旦被历史化为集体记忆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含义往往会被无视。但就杨著对历史资料的细致整理与考辨而言，此书无疑针对如今历史学界往往对“黄祸”、“病夫”等历史符号进行非历史(ahistorical)甚至是反历史(anti-historical)的论述做了精彩的批驳。(145-146页)

尽管杨著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笔者对此作仍有些许存疑。比如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1940-2017)的“自我东方主义”

(self-orientalism)之论点虽然贯穿于杨著全书，但由于对其理论的论述过于简单，导致了全书好像只是对德里克理论的补充与说明，并不是回应与挑战。其次，虽然杨著注意到了日本的舆论场对中国民族主义巨大的磁力，但对日本自身的民族主义的复杂面向却并未涉及。比如就“人种主义”而言，日本既有把中国囊括其中的“大亚细亚主义”，又有彻底抛弃中国的“脱亚论”。这些言论或多或少对中国的民族国家的理论构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当然，这些疑问并不对杨著的价值有所损益。实际上，就打破历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与民族自尊心“受害者情节”的历史图示而言，杨著既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又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¹ (上海)东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同志社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现代亚洲研究科。该文受到中国留学基金委资助，特此致谢。